

香港家長為子女選擇小學的考慮因素

許慧珠、譚偉明、余可茵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

學校為了長遠發展，必須瞭解家長對學校教育的期望，方能提供符合家長需要的教育方案。本研究探索香港家長替子女選擇小學的考慮因素，讓小學教育工作者反思其教育服務是否能滿足家長的需要。研究採用質性研究中的訪談法，對象是2003/2004年度就讀幼稚園高班的學生家長。研究發現，不同社經背景的家長為子女選校時，大都重視愉快學習、教師素養、教學過程、課程內容、宗教、家庭與學校距離等因素。然而，這些因素的考慮卻與家庭擁有的資本有關。

背景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英、美為首的西方社會為了提高國家的競爭能力，以應付全球化帶來的經濟衝擊，於是大力改革本身的教育系統。其中一項重要改革就是將教育逐步推向市場化 (Bridges & McLaughlin, 1994; Gray, 1991)。背後理念是期望透過市場競爭模式，迫使學校進行大幅度改革，以提高它的內部運作效率，以及提供迎合家長期望和學生需要的教育方案 (Chubb & Moe, 1990)。八十年代末，英國政府透過在報章公開學生的考試結果，讓家長獲得更多有

關學校表現的資訊，從而加強學校間的競爭 (Brown, Halsey, Lauder, & Wells, 1997)。此外，政府更容許地區學校脫離教育局的監管，轉變資助形式為「補助學校」(grant-maintained school)，令運作模式更具彈性，以及能自由選擇學生入讀 (Ball, Bowe, & Gewirtz, 1995)。九零年代，美國明尼蘇達州開始發展接受資助的「特許學校」(charter school) (Finn, Manno, & Vanourek, 2000)，讓家長和教師在公營和私營系統之間建立另具特色的學校。九零年代後期，美國各州政府亦爭相推出「學券計劃」(voucher plan)，以津貼形式資助一些家庭送子女入讀私立學校 (Center on Education Policy, 2000)。以上種種措施，都是為了增加公營學校間的競爭，以及為家長在公營學校系統以外提供更多選擇。

市場競爭為教育系統帶來莫大衝擊和不穩定的因素。舉例說，美國的「特許學校」讓來自不同社經文化背景的家長有更大機會為子女選擇心儀學校，這些學校每年吸引數以萬計的學生離開公營教育系統 (Finn, 2000; Levin & Belfield, 2003)。至2003年，全美已經成立超過二千五百多所「特許學校」，吸引超過六十多萬名學生入讀。現時不少地區（包括加拿大、香港等）都開始嘗試不同類型的學券制，認為這是增加家長選擇權力及提升學生學業水平的有效方法 (Robson, 2000)。

觀乎近年西方教育發展其中一個重要理念，就是利用競爭來推動學校更新，幫助它們擺脫官僚主義和現有體制的束縛 (Chubb & Moe, 1990)。形成學校間競爭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增加家長選擇學校的權力。學校為了生存，必須盡力團結全體教師，提供合適的教育方案，以增強學校競爭能力。學校亦需要獲得家長對學校的辦學方針和教育方案的認同，讓家長成為學校的擁護者，甚至協助宣傳學校的特色。

現代社會的市場行銷方式亦帶有類似含意。Porter (1987) 認為無論工商企業、服務性行業或公共機構，其生存之道就是建立市場策略。以他的觀點，一個產品能夠成功打入市場，除了採取減價的銷售策略外，最重要的還是為產品鑑別 (differentiation) 和定位 (positioning)。鑑別的意思是別具特色，而這些特色是其他產品未有

的，並能夠在市場上找到空間，獲顧客接受。一個產品要成功達到鑑別的地步，生產的機構必須認真地進行市場研究，瞭解社會上各階層人士對該產品的需求和偏好。當市場研究發覺產品在市場上符合某些群體的需求，機構便應該為該產品定位，然後針對產品的特色，建立市場形象，並積極宣傳這些形象和特色。Porter的市場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應用在教育界別。舉例說，現時香港不同學校具有不同特色，一些學校重視紀律和傳統，一些集中力量培養學生品格，一些著重推行創意教學，另一些則標榜學業成績。然而亦有一些學校雖然向外宣傳自己如何重視紀律、品格培養、創意教學，重視成績等，但卻未能確實將這些特色實踐在教育方案之內。因此，這些學校的市場策略可能只屬於宣傳，卻未有真正做到鑑別和定位的工作。

家長選擇學校的研究

西方學者在以往曾就家長選擇和家長對學校期望進行廣泛研究，所得結果亦有助學校改善教育服務。Taylor (2002)指出，家庭的社經地位、信仰、對子女的期望、家長參與子女學習的程度、家庭與學校的距離、家庭其他子女的學習情況、親屬或朋友的選擇或社會網絡等家庭因素，都與家長的選擇關係密切。Delpit (1995)針對家長價值取向進行的問卷調查結果發現，美國的白種人家庭比較支持學校強調德育和公民教育，並建立民主和共融的班級氣氛，黑種人家庭比較支持學校強調考試成績和生活技能訓練。Hirsch (1996)的研究也發現同樣現象。他的解釋是美國教育發展趨勢是重視教育過程（學生如何學習）多於重視教育產出（學生學到什麼）。他認為這些發展趨勢對基階層學生不利。因為倘若學校不強調學業成績的話，基層學生的支援系統未必能夠幫助他們越過升讀大學的門檻。Schneider, Marschall, Teske, & Roch (1998)在美國一個大型研究中探討家長對學校不同特質的意見，這些特質包括學業成績、道德和公民價值、紀律、尊重個人差異等四項。他們發現亞裔家庭重視學校紀律，但不

重視價值及個人差異；非洲裔家庭重視紀律和學業成績，但不重視價值；具大學學位的家長、在私校畢業的家長和中產白種人家庭都重視價值和個人差異。Gewirtz, Ball, & Bowe (1995) 在英國亦曾進行多個家長選擇學校的研究，發現家長選擇不同類型的學校，他們的選擇策略和對學校資訊的掌握能力，都與他們的社經背景有莫大關係。上述學者都不約而同地對於現時教育系統給予家長更大選擇權的政策有所保留，因為這些政策無疑是令到基層背景的家長更難幫助子女覓得高質素學校的學位，令教育系統內更易出現一個「貧者越貧，富者越富」的現象。

香港的現況

增加家長選校權已成為全球教育改革的趨勢之一，香港的教育改革也無法脫離這個軌跡。香港的教育當局為了提高家長的選校權，曾多次調整小學的入學機制。家長可以透過「自行分配學位」及「統一派位」機制為子女選擇學校。此外，由2004年開始，任何一所學校在第一階段收生人數少於二十三人，該校將不能開辦新學年度的小一班級。亦即是說，學校將要面臨「殺校」的危機。

在未來數年，香港整體出生人口持續下降，適齡升讀小學的學生人數將會逐年減少。學校可能因為收生人數不足而導致縮班的危機。為了爭取小一新生，學校必定盡力爭取區內家長替子女報讀自己的學校。現時，不少學校紛紛設立「學校形象組」、「公共關係組」、「學校與社區關係組」等行政組別，以便統籌校內力量，面對學校在社區的競爭問題。一些學校為爭取新生，更不惜花費大量金錢和人力宣傳學校，包括掛上大量橫額、爭取在社區和傳媒的曝光機會等。除此以外，一些學校會推行大量未知成效的新活動和教學嘗試，以標榜學校特色。

從教育角度看，學校在校內推行多元化的學校與社區關係活動，有助學校與社區加強溝通，凝聚社區力量支持學校。此外，學校推行多元化活動和嘗試教學創新方案，可以為課堂學習帶來更多生氣，

並增加學校活力。但是，學校必須認清這些工作的目的是什麼。是為了提升校譽，吸引學生，以求生存，還是為了更有效實踐辦學理想？此外，學校亦必須量力而為，不能因為求勝心切或危機感強而罔顧教師的負荷能力。學校因為害怕「殺校」而過於積極地宣傳自己，只會令教師身心疲乏，減少教學熱誠，失去對學生的愛心和耐性，最終只會令學校失去競爭力。

因此，學校要不斷進步，並在社區建立正面形象，就需要有選擇地提供教育方案來吸引家長，而不能漫無目的地向外推介自己。不少學者認為只要學校推行的教育方案能滿足家長的期望，符合學生的需要，就自然能夠吸引家長送子女就讀。因為家長的口碑，比學校自己的宣傳來得更實際和更有效 (Collins, 2001; Fiore, 2002)。從這個角度看，學校若要吸引更多家長為子女報讀，必須瞭解區內家長選校的考慮因素，以及這些因素背後的原因。這些資料將有助學校調整現有的教育方案，以符合家長期望，令家長更支持學校。

綜合上文所述，西方教育改革方向之一是將教育服務視為產品，並需要接受市場調節機制來改善品質 (Chubb & Moe, 1990)。一些人可能會批評這種將市場觀念套用於學校教育並不恰當，認為家長的訴求可能會影響學校的專業決定。Herbert (2001) 亦指出芝加哥學校推行校本管理之後，課程和行政均受到家長意願的影響。言下之意，就是學校為了照顧家長的意願，往往無條件採納家長的意見。家長的選擇漸漸便成為教育改革的「無形之手」 (Brown et al., 1997)。然而，無論我們是否接受以上的批評，學校都必須向家長負責。另一方面，接納家長的意見亦未必代表教育專業被動搖。家長的意見可被視為改進學校的參考資料，學校掌握了資料後，就需要運用教育專業知識，分析各種形勢，才制訂相關的改善政策。

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討家長選校的考慮因素，並嘗試瞭解這些因素背後的原因。所得結果將有助教育工作者反思如何滿足家長的訴

求。倘若學校能夠滿足家長的需要，又能堅守教育專業，則家長的意見具正面意義，有助學校提高教育質素。學校向家長負責，就是需要了解家長的需要和期望。若然學校與家長未有直接溝通，只憑空猜測這些需要及期望，則可能與實際情況有差別，甚至費時失事 (Woods, 1994)。

本研究對理論、實踐和政策均意義重大。第一，家長選擇權締造了學校間的競爭。家長的選擇影響學校的收生情形，同時亦決定學校能否立足社區。現時西方社會已有不少有關家長選擇學校的研究，香港亦有需要進行有關研究，以補充研究的空隙。第二，香港近年出生率下降，適齡入學人數遞減，令近年小一學額供過於求。學校確實有需要在社區定位，積極與家長及社區人士保持良好溝通，瞭解他們對學校的期望。本研究的結果將有助學校瞭解社會不同階層人士對學校的期望，幫助學校建立社區形象。第三，現代社會的公營機構重視問責。學校既然需要向家長負責，便應當重視家長的訴求，因此本研究可以幫助學校更能滿足社會問責的訴求。

研究方法

研究於2004年4月至5月間進行。這是一個合適的時間，因為按選校的程序，家長大概已經完成子女就讀小學的所有思想過程。家長選校經驗記憶猶新，所得結果的真確度較高。

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中的訪談方法，研究員與研究對象進行半結構性的訪談。訪談研究方法的優點是訪談內容可以個別化，也可以因應情況改變訪談策略，或針對問題深入探討。研究員接受訪者的意願將訪問內容用錄音或以文字方式予以記錄，並於事後將錄音內容重新寫成文字。之後，研究員再次複核訪問內容，以確定準確無誤，才開始進行資料分析。分析過程中，研究員將研究資料按不同主題分類，並循這些主題內容比較不同背景家長的考慮。

研究的對象是2003/2004年度就讀幼稚園高班的學生家長。研究員主要是通過幼稚園的幫助，獲得十位來自不同社經背景，居住粉

嶺、屯門及黃大仙三個地區的學生家長答應參加。香港小學類型中，津貼和政府學校都是以家長選擇為收生的依歸，本身不能選擇學生。故此，研究的對象都是集中於選擇這兩類學校的家長。

受訪對象都是自願參與，研究員向受訪對象解釋訪問目的，並讓他們明白參與是次研究絕對不會影響他們子女的選校結果。研究員在訪問前用電話聯絡受訪者，以確定訪談日期及地點，然後發出正式的邀約函件。由於人手問題，每次只能由一位研究員主持整個訪談過程。

家長的社經背景可以用不同方法界定，本研究是以家長的職業和教育程度來界定為中產及勞工階層兩類。中產階層家長的職業主要屬於教師、行政人員、經理、專門行業及技術性行業等，教育程度一般是中學以上。勞工階層家長的職業主要屬於半技術或非技術性，教育程度為中學或以下。

屬於勞工階層的研究對象合共五位，包括李太、周太、何太、楊太和任太。除了任太以外，其餘四位都是家庭主婦。李太是初中程度，曾經在荷蘭居住，丈夫任職貨車司機。周太和何太都是小學程度，丈夫分別是地盤工人和貨車司機。楊太也是小學程度。任太是酒店服務員，中學程度。屬於中產階層的研究對象共五位，包括洪太、陳先生、湯太、王太和林先生。洪太是幼稚園行政人員，大學程度。陳先生是護士，大專程度。湯太、王太及林先生均具大學程度。林先生是社工，其餘兩位是師。因為研究的重點並不在於探討家長性別帶來的差異，所以未有針對特定的性別選擇受訪對象；況且，在訪談的過程中，受訪者也曾表示另一家長也有參與或認同有關的選擇。

這項研究旨在探討家長選校的取決因素，但基於樣本數量的限制，研究結果未必適用於香港的整體情況。此外，本研究乃根據訪談中取得的資料來分析，研究者未能查核資料的真確性，這對研究結果的信度和效度構成一定的影響。然而，是項研究可視為一項先導計劃，作為日後在本地進行類似研究的參考。此外，在資源許可之下，亦可一併進行問卷調查，以檢定研究結果的可靠性。

結果和討論

本研究發現中產階層及勞工階層家長均非常重視教育，選校時所考慮的因素，有些時候會較為一致，例如對教師素養的要求，對宗教於教育中所造成的影響等；但有時候看似一樣，但再深入探究，卻有差異，例如對教育理念的理解；當然也有時候是明顯不同的，如對教育過程的掌握和對家校合作的理解等。詳述如下：

對教育理念的不同理解

訪談過程裏，無論中產或勞工階層，均表示希望孩子能夠「學得開心，讀得愉快」。受訪的中產家長表示會向在心儀的學校就讀的學生查詢，又會到現場觀察校內小朋友是否讀得開心，他們希望孩子可以在一個快樂、和諧的環境中學習。

勞工階層也有同樣的期望。周太曾詢問女兒喜歡選擇哪些學校，她相信只要是女兒自己喜歡的學校，女兒便會讀得愉快。另一位勞工階層的何太更在訪談初段即明確指出：

希望她在學校可以讀得開心一些，不想她不開心、鬧情緒。如果小朋友不開心，家長也會跟著她不開心……因為她暫時年紀小，主要是給她好環境，讓她開心些。

還有一位勞工階層受訪者雖然未有明確說出要孩子讀得開心，但訪談間，她一再強調不贊成默書及功課多。受訪者已將她個人過往默書的不快經驗跟不愉快的學習聯繫起來。她期望少默書，即少給孩子不愉快經驗。

然而，中產階層家長和勞工階層家長對愉快學習的理解未必相同。中產階層家長認為孩子在快樂的環境下可以對學習產生興趣，這樣便有助於孩子建立自我學習的能力。湯太強調子女自我學習的重要：

因為小學教育應培養學生有學習興趣，學生喜歡學習，對於他們將來面對學業、工作、社交等各方面有很大的益處。

其他中產階層家長也希望子女的知識有所增長。例如陳先生希望兒子在升讀小學以後，學業、品德和各方面都有優異的表現。王太也指出提升孩子的興趣很重要，希望這樣可以推動孩子自己一生去學習。由此可見，中產家長期望透過愉快的學習環境，讓孩子可以掌握到一些技能或提升其智能，為一生的學習而作出準備。愉快學習只不過是達到最終目的的一個中介過程。

至於勞工階層家長的重點會放在如何令孩子獲得愉快的學習經驗，而沒仔細考慮為什麼要愉快學習。何太認為：

不希望只是教，希望生動些，希望不要小朋友太多壓力，讓他可以自動學多些，不要只「監」著他讀、……抄功課等。

何太視功課和傳統教學為壓力的來源，而且強調壓力會令孩子不開心。周太不喜歡小朋友經常「讀死書」，所以她會選擇多些活動的學校，她認定了活一點的學校會令孩子多一點快樂。

由此可見，勞工階層的家長確切地期望子女能夠愉快學習，於是在選校時便剔除一些會令孩子不愉快的因素，例如壓力、刻板的教學、功課量多、考默多等。他們重視愉快學習，或許是跟他們的社經背景和社會網絡有關，因為不愉快學習帶來的後果可能會影響親子關係。何太、周太、李太不約而同地表示自己曾經目睹或聽聞一些學生因為在學校的學習壓力太大，以致孩子們返家後仍背負著不快的情緒及未完成的學習。這些負面情緒也間接令家長承受很大壓力，大大影響家庭生活和親子關係。

延續的學習或負面的情緒雖然同樣會出現在中產階層的家庭，但正如Lareau (1987) 所說，中產階層家長相信孩子的學習是需要家庭和學校共同承擔的。他們相信自己的能力並不遜於教師，亦有能力處理孩子的學習問題。基於中產家長社經和社會網絡的優勢，他們有能力自己幫助子女的學習，或聘請補習教師、或找親友協助、或尋求學校教師協助，這些方法都有助他們應付子女的學習問題。相反地，勞工階層家長卻沒有這些優勢，所以最佳的出路，就是學校能提供「愉快的學習過程」，以免他們陷入親子角力的煩惱。

對教育過程的掌握

訪談資料顯示，兩個階層的家長對教育內容有不同的掌握程度，當中的分別便是家長所擁有的文化資本。勞工階層大多數以鄰近家長的口碑作為參考指標。周太和何太就是典型例子，她倆均沒有提及會再從什麼途徑得知學校的資料。何太受口碑的影響更明顯，她表示當有家長指某校不好時，她也會不選擇該校的。中產階層家長除了基於知識水平令他們對教育方面的認知較多外，他們還會透過不同的渠道加深對心儀學校的認識。例如林先生會參觀學校，甚至跟校長傾談，了解學校的情況。王太會先鎖定一些心儀學校，然後跟這些學校的家長和小朋友談話。除了交談之外，她亦會留意報章對心儀學校的報導，甚至索閱學校的書籍、手冊、家課和測驗等，以便更深入地瞭解這些學校。

林先生及王太不約而同地表示一所學校的運作往往是環環相扣的。林先生以「相輔相成」來表達，王太則認為學校的成功不是單賴某一環，只要某一環脫軌，也難做出成績來。所以他們認為對學校的認識也應全面一些。林先生在訪談中曾提及課程、教學理念、教學氣氛、師生關係、朋輩關係、學校文化、秩序、學校的風氣、功課、評估、學校的規模、個別的照顧等。而王太曾提及的包括課程、功課評估、閱讀風氣、教學態度、宗教、課外活動的類型、上課時間、授課語言等。至於勞工階層方面，家長最多提及的是教學態度、教學方法、功課量等。在研究員追問下，他們也只會談及課外活動和朋輩關係。由此可見，替子女選擇小學時所考慮因素的多寡與家長本身的社經背景有關。

當受訪者闡述他們對某些因素的要求時，其深度也有差異。勞工階層及中產階層家長均表示他們對課程有要求，但側重面卻明顯有異。勞工階層家長談及課程時，往往要求活的教學。他們認為「活」的意思就是不刻板，孩子便可學得更開心。李太比較具體一些，她期望的「活動教學」是：

可以外出的……是一種即興……即剛教某些東西，又可以即時帶小朋友出外考察。

由此可見，勞工階層看重的並非課程的內容，而是一種教學的手法。

至於中產階層方面，家長談及學校課程時，會探討學校的課程能否達到他們的一些預定目標，例如林先生和王太要求的是培養孩子的能力。林先生舉例指出：

英文是怎樣教的……有些學校側重死背爛背，都沒有培養一些學習技巧……要有技巧的，譬如有沒有教拼音呢？令小朋友掌握到怎樣讀。

王太也舉例指出對課程的要求：

教學方法和課程設計很重要，例如一般是透過文章去認識詞彙，現在選的學校是由文法著手的……小朋友借電話，入圖書館借書，也要用英文。

由於中產階層家長較能掌握教育過程，因此他們在剖析個人需要時，可以比較全面。他們理解到自己對課程的要求是什麼，於是循這些方向為子女選擇學校。然而勞工階層家長因對教育過程掌握不多，於是在探討個人需要時，即使同樣會留意課程，但要求就較為簡單直接；只要是活動的、不刻板，又可以達到愉快學習目的的課程，就已經達到他們的要求了。

對教師素養的要求

本研究發現兩個階層的家長同樣重視教師的素養。中產階層的王太表示教師的鼓勵比家長的鼓勵還要重要，而這鼓勵更會直接影響孩子的學習興趣。另一中產階層林先生指出：

較小的學校，學生及老師能彼此認識得好一點，覺得親切一點，於是尊重的程度會比較容易建立。

林先生認為教師和學生間要建立密切一點的關係。

勞工階層家長對於教師素養的要求更殷切。李太和何太在訪談過程中不斷提及希望教師對學生要有愛心、要好、要有熱誠。周太在聽取口碑時，也會特別留意老師方面的訊息，她期望着良好的師生關係，她指出：

……譬如妳跟她說話，看她是怎樣處理事情……起碼要於友誼上建立得良好才可以……態度不好也沒用，孩子是不會接受你的。

綜合不同階層家長的意見，家長要求的教師素養中並沒有提及教師的學養問題。李太曾居住荷蘭一段時間，她認為香港教師要面對很多改革，著實令盡責的老師承受很大的壓力。李太對香港教育有不少怨言，也對不稱職的教師表達不滿。然而，在連番批評中，並未有提及教師在學科知識或語文能力上的問題，反而是針對教師對學生的愛與關懷來評論。即使非常關心孩子學習能力的王太和林先生，在列舉眾多考慮因素中，也沒有提及教師的教學能力。

綜合上一節和本節的討論，可知教學熱誠、教學態度和教學方法都是極受家長重視的。教育工作者應理解到上述都是教育工作中必須的元素。因此，對於教學方法的檢討和革新，對於教師熱誠的啟動和保存，就並非只是應家長的要求，而是有其確實的需要。因此，校方在盤算教師資歷的同時，也需要於行政安排上，監察及發展教師的教學法，更需要努力建構一股充滿關愛、熱誠的學校文化。

根據 Vanourek, Manno, Finn, & Bierlein (1997) 的研究顯示，教師素養被中產收入及低收入人士都視為五大需要考慮因素之一。Taylor (2002) 在另一研究亦有類似發現，教師能夠提供關愛的環境是家長最重視的條件之一。雖然中西文化有所不同，但對教師素質的要求卻是一致的。

對家校合作的理解

訪談過程中，明顯發現中產階層和勞工階層家長對家長在教育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有著不同的理解。在勞工階層的受訪者中，大

多數不曾提及家長要參與孩子的學習過程，李太闡述心目中理想的教學過程時指出：

不用家長在家給學生默，學生只須在學校寫、寫、寫，然後給老師計分，回來給家長簽名。

明顯地，李太覺得教育是教師的工作，家長不用太多的參與。勞工階層家長何太表示家庭和學校是需要合作的，不過，她所指的是集中在孩子行為表現上，而沒提及在學習上如何作出配合：

小孩子一知半解，根本上不知道自己做錯，所以要家長和學校互相幫助。不可只想著在學校就由老師教，家長可以不理。

至於中產階層受訪者林先生則已知所選的學校因著重閱讀興趣的發展而令課外活動較為貧乏，也預計家長在這方面要投放資源，以補學校教育上的不足。湯太也認為父母需要配合學校，當孩子出現學習上的困難時，家長就需要設法協助解決。中產階層王太更清楚指出家庭角色的重要，她認為：

要跟老師有共同目標，大家要有默契，才知孩子的發展情況。家長要明白孩子有什麼不足之處，才能在家中做補充的教導。

兩個階層對家校合作的不同理解，與家長的社經和文化背景有著一定的關係。中產階層家長因其優越的社經及文化背景，一般比勞工階層家長更能投入子女的教育過程。因此，校方在決定家校合作的措施時，需要明白到部分家長對於參與孩子教育仍未有充分的準備，或缺乏資源的配合。因此，在教育機會均等的前提下，學校實在需要考慮到為這些勞工階層家長創造較有利的家校合作條件，令這些家長能更主動地參與子女的教育(Lareau, 1987)。

宗教對家長的影響

本研究的結果顯示，無論什麼社經階層的家長，都比較喜歡宗教團體主辦的學校。他們不單相信宗教團體主辦的學校對學生特別

有愛心，這未必是因為他們本身對於宗教的嚮往，而是他們相信這些辦學團體的經驗和規模。楊太指出：

我相信由宗教團體所辦的學校，如天主教和基督教。這是因為那些辦學團體有多年的辦學經驗，規劃和制度也較完善，而且多有直屬中學，所以，我希望兒子能入讀由宗教團體所辦的學校。

王太相信宗教信仰是塑造良好品格的有利因素，她表示無論是什麼宗教總比沒有宗教信仰的好：

我選擇學校有一點也重要，就是宗教……有宗教的學校，學生的品格比非宗教學校佳。

在香港，宗教團體辦學歷史悠久，當中以天主教和基督教所佔的比例最大。一直以來，這些學校的表現令很多家長都滿意。再者，教會對學生行為和品德的要求一向是嚴謹的。基於這些歷史因素，無怪乎家長會認為有宗教背景的學校對學生品德的培養是較佳的。

學校與居所距離的關係

研究發現勞工階層家長比中產階層家長更重視學校的位置。何太很早已經肯定不會選擇跨區的學校，因為她認為本區已有不少學校可供選擇。周太也表示始終以「近」為首要考慮的條件。李太的選擇也是基於「近」，即使她現時所選的學校未能滿足她「少功課、少默寫」的要求，也因貪方便而放棄該項考慮因素。她的理由是隨時可以看到孩子的情況。

中產階層的王太雖然沒有提及遠近問題，而據研究員所得資料，王太所選的是一間跨區學校，但她曾表示不選擇國際學校的原因之一是路程太遙遠。另一位家長林先生不會否定遠一點的學校，但表示會小心考慮，原因是擔心孩子在路途中過於勞累。

兩個階層家長在選校過程中，也曾考慮學校與居所的距離，只是考慮的比重不同而已，勞工階層家長比中產階層家長更看重家居與學校的距離。這些結果與西方國家的情況頗為接近。美國

教育部的調查發現，公立學校家長較私立學校家長著重學校的距離。Ball et al. (1995)的研究中亦有相同發現，工人階層家長會考慮一些可步行或乘公共交通工具前往的學校，中層家長則在合理距離及安全方面考慮，而且也並不視之為選校時很重要的因素。報告中更指出這與不同階層的社經地位有關，中層對距離的考慮較少，因他們可以有足夠能力聘請他人協助及使用較昂貴的交通工具代步。

總結及建議

上述發現與西方研究發現有異同之處。美國的中收入人士跟香港的中產階層有一共通處，就是對教學理念的重視，這顯然是與家長本身的教育水平有關。美國中收入及低收入家長均重視學業水平，但這點在本港兩大階層家長中卻未普遍提及，相信這是與兩地教育制度不同，以及競爭情況有關。香港的家長很清楚自己必須付出很大努力，才能讓子女獲得優異成績，因此都不願意提及成績的問題。至於家長參與子女教育的機會，兩地都同樣受到各階層家長的重視。但是對於家長如何參與，則有明顯的階級差異 (Lareau, 1987)。本研究亦發現，家庭的社經背景是選擇學校的重要客觀因素；中產和勞工階層的家長為子女選校時考慮的因素表面上是大致相同的，但經過深入探討後，卻發現背後的差異很大。這些差異都與家庭所擁有的經濟資本、人力資本、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有關。在香港這個愈趨競爭劇烈的大氣候下，一所學校如何在教育專業的大前提下，面對家長的不同訴求而又不違社會公平的原則？透過本研究結果，我們可以從下述各層面加以考慮：

學校行政

校本政策 家長期望子女在學校除了學習知識以外，還能獲得關愛和照顧。這就需要學校全體員工與學生真誠相處，願意為學生的心靈需要而努力，建立一種融合和關愛的文化。學校營造關愛文

化，不僅是為了滿足家長的訴求，更是體現教師的專業精神——以生命影響生命。

家課政策 研究發現大部分家長都希望學校少家課，但各人對家課數量的標準差異很大。這個問題帶給學校以下啟示。第一，家長也認同家課的重要性，只是未能掌握恰當的數量，學校應訂明家課政策，讓老師有所依循。第二，學校需要與家長建立良好溝通渠道，讓家長瞭解家課政策和執行方法。

收生政策 香港小學的收生政策基本上是完全受制於現行的小一入學統籌辦法。雖然學校已失去收取學生的自主權，但學校也可從社區定位上爭取主動權。研究發現兩個社經階層的家長都比較喜歡子女就近入學，那麼，除了因歷史背景而需要跨區收生的學校以外，各官津小學就應該以鄰近區域的家長為吸納對象，了解家長的社經背景及對學校的期望，然後針對性地在課程、教學法、課外活動等方面定出合理方向。

學校課程

研究結果顯示，掌握教育過程的家長對課程內容有實質要求，而未能掌握教育過程的家長未必能夠明確地指出他們對課程內容的要求，這是基於他們擁有不同的文化資本。一個公平的社會應該提供機會，讓不同社會階層的人士，只要通過個人努力，都可以追求自己的理想。學校是一個提供均等教育機會的場所，讓不同階層的學生都可以接受優質教育。學校必須盡量減低擁有不同文化資本的家庭帶來的差異，其中一個方法就是將本身的課程內容和特色闡述得更透徹清楚，正如上文所指，為了讓不同背景的家長都可以清楚明白，舉辦一些講座來陳述有關訊息會較能顧及社會的公平性。

教師素養

研究發現，教師的素養是所有家長都重視的考慮因素。家長不但期望教師能在教學中發揮其專業知識與能力，更要求教師具教學熱誠，對學生關懷愛護。因此，學校應注重教師的培訓，不單要提

升學術和教學的質素，也應具有輔導學生的能力，能對教育「委身」。這是因為現在的學生除了面對學業的問題，也需要面對家庭與社會的種種壓力。所以，當一位具素質的教師，不但要掌握「教學」的技巧和學養，還要具備「教人」的理念和態度。

家校合作

本研究發現，不同背景的家長對家校合作有不同理解。很多中產階層家長都清楚而且重視自己參與子女教育，故此他們會對學校的課程設計提出意見，嘗試參與其中；亦會於子女學習上與教師建立伙伴的關係，共同輔導子女學習。很多勞工階層家長都認為家校合作只局限於家長協助學校的運作，以及為了改善學生的學習和行為而溝通。因此，學校應投放更多資源，教育家長，讓勞工階層家長也明白家長所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學校亦應盡量提供更多元化的參與機會給不同階層的家長，了解不同階層家長的需要，從而提供不同時段、不同模式的活動。此外，勞工階層家庭很多都是全職主婦，時間運用可以較靈活，學校不妨讓他們參與實在的協作；具一定教育程度或工作時間不具彈性的家長，學校可考慮讓他們透過資訊科技的渠道或在討論政策層面上參與。一些熱心的家長可以起帶頭作用，推動比較被動的家長一起參加家校活動，一同創造更佳的合作條件。

參考文獻

- Ball, J. S., Bowe, R., & Gewirtz, S. (1995). Circuits of schooling: A sociological exploration of parental choice of school in school-class contexts.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43(1), 52-78.
- Bridges, D., & McLaughlin, T. H. (Eds.). (1994). *Education and the market place*. London: The Falmer Press.
- Brown, P., Halsey, A. H., Lauder, H., & Wells, A. S. (1997). Introduction. In A. H. Halsey, H. Lauder, P. Brown, & A. S. Wells (Eds.), *Education: Culture, economy, socie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enter on Education Policy. (2000). *School vouchers*. Washington, DC: Author.
- Chubb, J. E., & Moe, T. M. (1990). *Politics, markets and America's schools*.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 Collins, J. (2001). *From good to great*.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 Delpit, L. D. (1995). *Other people's children: Cultural conflict in the classroom*. New York: New Press.
- Finn, C. E. (2000). *Reinventing public education via the marketplace*. Vancouver, Canada: Fraser Institute.
- Finn, C. E., Manno, B. V., & Vanourek, G. (2000). *Charter schools in action: Renewing public educa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Fiore, D. J. (2002). *School-community relations*. Larchmont, NY: Eye on Education.
- Gewirtz, S., Ball, S. J., & Bowe, R. (1995). *Markets, choice and equity in education*.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 Gray, L. (1991). *Marketing education*. Philadelphia, PA: Open University Press.
- Herbert, J. W., & Joseph L. B. (2001). Understanding market-based school reform. In M. C. Wang & H. J. Walberg (Eds.), *School choice or best systems: What improves education* (pp. 3–37).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Hirsch, E. D., Jr. (1996). *The schools we need and why we don't have them*. New York: Doubleday.
- Lareau, A. (1987). Social-class differences in family-school relationships: The importance of cultural capital. *Sociology of Education*, 60, 73–85.
- Levin, H. M., & Belfield, C. R. (2003). The marketplace in education. *Review of Research in Education*, 27, 183–219.
- Porter, M. (1987). From competitive advantage to corporate strategy.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65(3), 43–60.
- Robson W. (2000). *Publicly funded education in Ontario*. Vancouver, Canada: Fraser Institute.
- Schneider, M., Marschall, M., Teske, P., & Roch, C. (1998). School choice and culture wars in the classroom: What different parents seek from education.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79(3), 489–501.
- Taylor, C. (2002). *Geography of the "new" education market*. Aldershot, Hampshire: Ashgate.

- Vanourek, G., Manno, B. V., Finn, C. E., & Bierlein, L. A. (1997). Charter schools as seen by students, teachers and parents. In P. E. Peterson & B. C. Hassel (Eds.), *Learning from school choice* (pp. 187–211).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 Woods, P. (1994). Finding out what parents think of your school. In M. Crawford, L. Kydd, & S. Parker (Eds.), *Educational management in action: A collection of case studies*. London: The Open University Press.

附錄：訪談指引

1. 閣下在什麼時候開始替孩子選校？
2. 跟誰一起為孩子選校？
3. 選校的過程是怎樣的？
4. 選校時，會考慮些什麼因素？
5. 為什麼會認為這些因素重要呢？
6. 除上述以外，還會注意別的因素嗎？
7. 會否考慮到該所學校的 _____（具體指出）
8. 所選的學校具備這些條件嗎？
9. 在眾多因素中，會以哪一項作為最主要的考慮因素？
10. 在眾多因素中，某校如缺乏哪一項，那就不會選擇呢？

Factors That Hong Kong Parents Consider When They Choose Primary Schools for Their Children

Wai-chu Hui, Wai-ming Tam, and Hoi-yan Yu

Abstract

In order to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to provide appropriate educational programs that will meet parents' needs, a school must understand the expectations of parents about school education. By exploring the factors that parents consider when choosing primary schools for their children, the present study aims to facilitate primary educators to reflect upon whether their education programs can meet parents' needs. This study employs qualitative interview method, and the targets are parents whose children are studying in kindergarten K3 classes in the 2003–2004 school year. Findings suggest that parents from different social backgrounds would consider factors such as pleasurable learning, teacher quality, teaching process, curriculum content, religious affiliation and home-school distance when they choose primary schools for their children, but the way they consider these factors and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are very much determined by the capitals they possess.

譚偉明，香港中文大學教育行政與政策學系助理教授。

許慧珠、余可茵，現職小學教師

聯絡電郵：wmtam@cuhk.edu.hk